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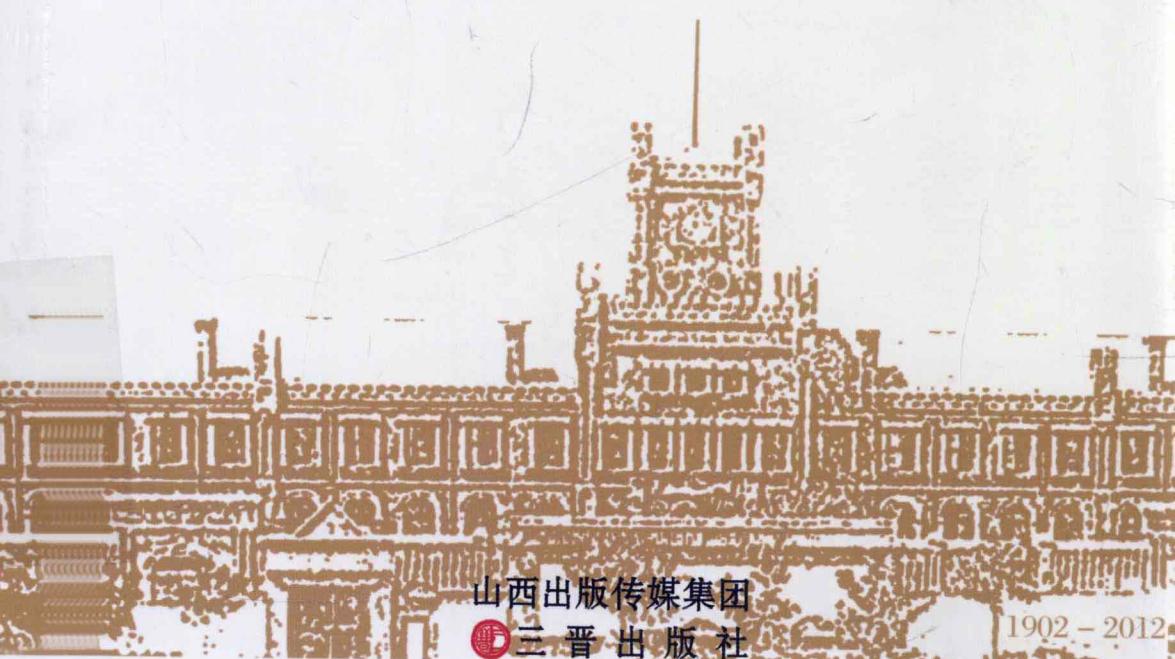


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

时代边缘的沈从文

SHIDAI BIANYUAN DE
SHENCONGWEN

尹变英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1902—2012

时代边缘的沈从文

SHIDAI BIANYUAN DE
SHENCONGWEN

尹变英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时代边缘的沈从文 / 尹变英著. —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457-0523-2

I. ①时… II. ①尹… III. ①沈从文(1902~1988)—人物研究②沈从文 (1902~1988)—文学研究 IV. ①K825.6
②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3441号

时代边缘的沈从文

著 者: 尹变英

责任编辑: 田潇鸿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版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 (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4956036 (综合办)

0351-4922203 (印制部)

E-mail :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嘉祥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523-2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序言

2012 年 5 月 8 日,山西大学将迎来 110 年校庆。为了隆重纪念母校 110 年华诞,系统展现近年来山西大学创造的优秀学术成果,我们决定出版这套《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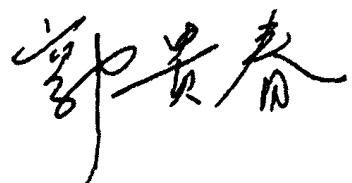
山西大学诞生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时代,在“西学东渐,革故鼎新”中应运而生,开创了近代山西乃至中国高等教育的先河。百年沧桑,历史巨变,山西大学始终与时代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学术实践,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办学业绩。百年校庆以来,学校顺应高等教育发展潮流,以科学的发展理念引领改革创新,实现了新的跨越和腾飞,逐步成长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科研实力雄厚的具有地方示范作用的研究型大学,谱写了兴学育人的崭新篇章,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大学因学术而兴,因文化而繁荣。山西大学素有“中西会通”的文化传统,始终流淌着“求真至善”的学术血脉。不论是草创之初的中西两斋,还是新时期多学科并行交融,无不展现着山大人特有的文化风格和学术气派。今天,我们出版这套丛书,正是传承山大百年文脉,弘扬不朽学术精

神的身体力行之举。

《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的编撰由科技处、社科处组织,将我校近 10 年来的优秀科研成果辑以成书,予以出版。我们相信,《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对于继承与发扬山西大学学术精神,对于深化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对于促进山西高校的学术繁荣,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谨以此丛书献给历经岁月沧桑,培育桃李芬芳的山大母校,祝愿母校在新的征程中继往开来,永续鸿猷。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目 录

《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序言	(1)
绪 论 从边缘走向中心	(1)
第一章 批评活跃的时代	(12)
第一节 “时代”作为一种文学批判标准	(13)
第二节 “时代”作为一种影响文学的魔力	(16)
第三节 对左翼文学的批评	(29)
第二章 边缘化的文学创作	(43)
第一节 边缘化的文学视野的形成	(43)
第二节 困境的发现和体验	(59)
第三节 《长河》中“常”与“变”的冲突与融合	(92)
第四节 民族文化忧虑	(105)
第五节 梦魇式的创作试验	(112)
第三章 在新旧时代的交叉点上	(139)
第一节 艰难的选择	(139)
第二节 被选择中的恐惧与绝望	(151)
第三节 粘合生命的诗篇	(171)
第四章 在新时代的边缘	(183)
第一节 沉默“归队”	(184)

□ 时代边缘的沈从文

第二节 边缘化的创作尝试	(191)
第三节 对历史的思考	(199)
第四节 对生命的思考	(209)
结 语 脱开时代,面向未来	(231)
后 记	(233)

绪论 从边缘走向中心

沈从文的作品留给我们的是一片丰茂的原野,你可以从中采摘各种各样的花朵,还有丛生的杂草。他自己也说过自己:“正如一个荒凉的原野,一切在社会上具有商业价值的知识种子,或道德意义的观念种子,都不能生根发芽。”^①《沈从文全集》的出版让人们更清楚地感受到这种芜杂,但这片原野充满了生机。这就是他的园地一再被闯入的原因。每一个研究者都只是一个闯入者。

沈从文是个异类。他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异类,现代文化的异类,更重要的是他是所有流行的意识形态的异类。他拒绝别人从他的作品中寻找“观点”就是拒绝被界定,被纳入任何的观念体系,拒绝认同,其态度是非常坚决的。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他和他作品的存在从一个点上认证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独特价值。那本身就是一个过渡的时代,充满了此起彼伏的潮流和倾向。那个时代容纳并培育各种各样激烈的情绪,容纳和培育各种各样的“思想”。但这并不是因为它理想,而是因为它本身已经破损得自顾不暇。那些情绪和思想就像是废墟上的荒草一样,当人们还来不及践踏和删刈它们的时候,显得格外得茂盛和自由。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在《野草·题辞》中所说的,那个时代本身就是一个荒原,一切都是陈死的,有生命力的只有那些野草,它们“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②。野草是生命,是坚毅无比的生命,是证明那个世界还是个有希望的世界的标志。在那个时代,每一个思想着,战斗着的人都是野草。沈从文的特别也由此养育。而他也“野”得特别得彻底。他的“野”表现在对一切主流文化的怀疑甚至排斥上。这就使得他的被接受显得相当艰难。

对沈从文的理解需要相当宽松的文化空间。沈从文完全是我们文化内部的产物,可他却比任何的外来者都更像个异类。这只能说明我们对自己文化的

^①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M]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23

^② 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全集》[M]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59

丰富性还缺乏了解,我们对自己原本相当广阔的文化空间缺乏认识。沈从文的声音的特异性主要来自于主体对自我的心灵和情感的绝对的忠诚,从而拉开了与那些寻求和领导公众声音的人们的距离,而不是在本质上就有永远无法靠拢的距离。不必被蒙在他作品表面的那层异域色彩所迷惑。但正是因此,沈从文和他的作品被排斥和接纳的过程曲折起伏。“沈从文”一直像一朵野花那样默默地开着,等待着属于自己的命运。

我们首先梳理沈从文研究在各个时代的不同研究视角,并在对这些视角的梳理中,探索沈从文研究的新视角,从而引出本书的主题。

一、曾经对立的批评视角

对于沈从文的研究,采用审美的视角和社会评判的视角几乎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所以被误解的感觉一直困扰着沈从文。他甚至以限定读者来表示自己的不满。沈从文认为多数人对他作品的阅读是买椟还珠,只能读出清新和朴实,读不出隐在背后的人情和悲痛。他说他的书不是为这样的多数人写的。对于简单化他的作品内涵,沈从文是不胜伤感的。即使对于李健吾这个知音,沈从文也认为他没有得到自己作品的深意。沈从文觉得自己的作品像个四处碰壁的孩子,不能被那些各持观念的人们所理解。所以他写了很多的文章来帮助读者认识自己的作品。那种解说的热情里包含着他渴望被理解的心绪。

在 1949 年以前,对于沈从文的研究和评价几乎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其实,不同的评价源于各自研究视角的选择。而且由于沈从文在不同的创作时期作品本身的价值差异就比较大,所以不同的评价也源于不同的研究对象的选择。肯定沈从文作品的,认为他的创作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创作领域,徐志摩、苏雪林都有这方面的肯定。苏雪林认为沈从文的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 20 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①。苏雪林提到了沈从文作品所具有的民族性思考的主题。更重要的是苏雪林的《沈从文论》中这样一段评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以下等阶级而论则像船夫,厨子,仆役,草头医生,小店主,边城旅店的老板娘,私娼,野鸡,荒村的隐者,老农夫,小贩子,运私者,木

^① 苏雪林.《沈从文论》 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C]. 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91 66.

匠,石匠,建筑工人,猎人,渔夫,强盗,土匪,兵士,军队中的伙夫,勤务兵,刽子手……也曾在他的作品中当过一度或数度的主角。不过作者对于写作题材虽然这么‘贪多’,而他的人生经验究竟不怎样丰富,他虽极力模拟他们的口吻,举止;解剖他们的气质,研究他们职务上的特别名称,无奈都不能深入。他所展露给我们观览的每一个人物,仅有一副模糊的轮廓,好像雾中之花似的,血气精魂,声音笑貌,全谈不上。我们若把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丁玲的《法网》,《水》;鲁迅的《风波》,《祝福》,《阿 Q 正传》等篇,和沈从文作品并读,便可以辨别出写作工力的差异来。这就是说茅盾等人的作品好像一股电气震撼读者心灵,沈从文的作品,则轻飘飘地抓不着我们痒处。”^①苏雪林提到了沈从文极为广阔的创作视野,并将他的作品与左翼作家如丁玲、茅盾、鲁迅等的作品相比较。不管她的观点如何,给后来者的启示是,沈从文的作品和左翼文学之间是有某种深切的联系的,这种联系非常值得研究者深入挖掘。吕慈在《论沈从文》中曾这样感叹过:“沈从文先生为什么不能走到如他的朋友胡也频君等的一步呢?”^②这恐怕也是很多看过沈从文作品的人的一个疑问。他是描写乡土和底层很多很丰富的一个作家,他来自于社会的底层,他有很多左翼甚至是共产党的朋友。他为什么没有成为左翼作家呢?其实是以“审美的”视角来观察和描写底层世界拉开了沈从文与左翼文学之间的距离。另一类是从艺术和美学的视角来肯定沈从文的创作。代表是同为京派的李健吾。他认为沈从文是渐渐走向自觉艺术的小说家。他的批评对沈从文作品的美学品质进行了解析和肯定。

否定的声音主要来自左翼的批评家。在 1930 年代以贺玉波和韩侍桁为代表。贺玉波和韩侍桁都是左翼批评家。贺玉波 1927 年就已经是共产党员,1931 年组织中国普罗文艺社。韩侍桁 1930 年加入左联。他们都从缺乏“思想”的角度批评沈从文。贺玉波的《沈从文的作品评判》也认为沈从文的作品有一部分是内容空虚的,他有的作品“思想极其模糊而容易被人误会的”,“总之,沈从文是个没有思想的作家”^③。韩侍桁认为沈从文是以“空虚的题材与轻飘的文体”,“最有力地诱引着读者们于低级的趣味的作者”^④。来自左翼方面的思想性的质疑显示了左翼文学批评视角的单一。1940 年代以郭沫若和成仿吾为代表的批评则从政治的视角评价沈从文。郭沫若和成仿吾对沈从文的否定本

^① 苏雪林.《沈从文论》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C].45 - 46.

^② 吕慈《论沈从文》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C] 17

^③ 贺玉波《沈从文的作品评判》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C] 89,129

^④ 韩侍桁《一个空虚的作家》.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C].19

身就有复杂的渊源。因为沈从文在自己的文学评论中，对郭沫若，对整个创造社都是同样不客气的。只不过沈从文批评创造社的时期，他处在一种文坛边缘的位置，他的批评不会对创造社和郭沫若的价值产生根本性的动摇。但郭沫若和成仿吾批评沈从文的时候，他们处在一种引领文学发展新方向的主流位置，而这种新方向又直接连接着整个新中国建立的方向，所以是一种非常强势的位置。沈从文对于时代的热情批评让他召来了左翼作家们的非议和攻击。郭沫若称他是反动派，冯乃超认为他是地主阶级的弄臣。这就纯粹是政治视角而非文学视角的批判了。他们的否定带来了对沈从文创作和命运的根本性颠覆。这里就潜藏了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沈从文的作品和左翼文学之间有这么深切的对立吗？这种对立主要是时代的原因，外在的原因，在对底层人民的关注和热爱的情感上二者之间其实是相通的。

1949 年开始，沈从文的作品及其价值被拒斥到新中国的话语系统之外。但在 1957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沈从文的作品出了一本选集。这是沈从文的作品和左翼文学之间有密切关联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对于重提自己的作品，沈从文心中充满了酸楚之感。他在给大哥的信里，表达了对这件事的心情。首先那种渴望被认识和接受的心境依旧，他怕他的作品如果不在这一唯一的机会里集印，就“大致永远也不会和读者见面了”。但他又非常清醒地知道，自己的作品被重印只是一种文化上的点缀而不是真正被发现了，它的目的只是“让国外各方面明白中国并不忽视‘五四作家’，还有机会把作品重印而已”。他认为他的人和作品都“过了时”，是不会有人再在意了。“过去写的东西，即家中龙虎都不爱看，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好处，怎么还能希望陌生读者发生兴趣？”一边是哀惋，一边是愤慨：“这也是一起始写作早就料想到的。三十年前在一切想象不到困难中还能始终坚持用笔，也就早估计到在国内社会变动中，写作必要从写作以外来竞争，决不是有机会和人把作品公平摊到读者面前，让读者公平选择。”对于自己的作品被遗忘，失去读者，他实际上并不认为是自己的原因，而是“文学以外”的原因在起作用。他还是在坚持自己的文学观念。对于别人的成功，沈从文觉得“我完全如一个在戏院外的观众，只遥遥听着戏院中的欢笑喝彩声音，觉得也满有意思。这一切都像和我已隔得远的”^①。对于自己辛勤耕耘过的土地只能任其荒芜，这种感觉当然是很酸楚的。基于这种心情和对时代的这种认识，沈从文对于这次让别人认识自己的机会把握得非常谨慎。在《沈从

^① 以上均见《致沈云麓（1957年1月9日）》《沈从文全集》20卷. 137 - 140

文小说选集·题记》中,他尽量按照新的语境来回顾自己的人生和创作生涯。他说自己早年在“土著部队”中过了几年“痛苦怕人生活”。他明确和单纯化了自己的创作目的,就是要用文学的“新工具”“动摇、推翻、扫荡”那个统治者骑在人民头上,对人民极端无情的社会。他强调了自己对故乡人民的熟悉和亲近。他承认了别人对他下的断语:狭窄、保守凝固、落后,并认为自己的作品确实应该被忘记。新的希望是留给党领导下的文学青年的。而新时代的内容应该是“讴歌人民在觉醒中,在胜利中,为建设祖国、建设家乡、保卫世界和平所贡献的劳力,和表现的坚固信心及充沛热情”^①。他强调了自己的作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也指出了自己的作品对旧社会的批判色彩。这使得他的作品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关联更为密切了。所以,以左翼文学为参照来研究沈从文的思想及其创作,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视角。

二、沈从文被“发现”的西方语境

就在沈从文的作品被人们遗忘,他自己也已经认同这一命运的时候。他的价值却在国外被逐渐认识,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沈从文的奇特表现在:对于他来说,研究者的视野越广阔,可发现的就越多,相反,狭隘的人在他那里往往一无所获。而且,研究者必须具有一双对美特别敏感的眼睛。

其中较早,对沈从文的认识也较准确,且对国内认识沈从文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的是美籍华人夏志清的研究。在他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沈从文有专章的论述。他的评论为沈从文研究既开辟了前景也设置了误区。夏志清的发现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他认为沈从文属于整个世界,他的作品遥遥呼应了叶芝、华兹华斯、福克纳等世界级的著名作家。第二点,他认为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想象力最丰富的作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第三点,他肯定了沈从文的“乡下人”立场的价值。第四,他总结了沈从文作品中最重要的两类人:“天真未凿,但快将要迈入成人社会的少女,陷于穷途绝境,但仍肯定生命价值的老头子。”第五,他肯定了沈从文文体上的特征,并认为他的文体和他的内容是一体的,不可划分的。最重要的一点,他挖掘了沈从文作品的思想内涵,就是人类社会对“神”、“自然”和“美”的永恒依赖。“在唯物主义文化的笼罩下,人类得跟神和自然保持着一种协调和谐的关系。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我们保全做人的原始血性和骄傲,不流于贪婪与奸诈。”

^① 以上均见《〈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沈从文全集》16卷,372—377

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和老人“代表人类纯真的感情和在这浇漓世界中一种不妥协的美的象征”。这是最重要的，沈从文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虽然他只能从一片小小的土地里开掘，但他挖得确实很深。但夏志清对沈从文的认识带有很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偏向。他突出强调了沈从文与左翼的疏离和不合作，他认为沈从文所表达的思想与左翼批判偏远乡村的落后与愚昧的启蒙声音和要求革命的激进态度完全不合拍。并认为这种分歧证实了沈从文“代表着艺术良心和知识分子不能淫不能屈的人格”^①。与之相应的，他认为沈从文是一个十足的保守主义者。他显然夸大了沈从文及其作品与左翼文学之间的距离和隔膜。但夏志清的研究确实为沈从文研究打开了一扇大大的门，迎来了蜂拥而至的人们。

或许沈从文更容易得到女性评论者的认同。1972年，美国华裔女作家聂华苓用英文写的《沈从文评传》在美国波士顿出版。这是沈从文的第一部评传。她指出了沈从文观察世界所采取的“人类”视角。“作家的这种包罗万象的视野自然需要同样纵观全貌的人类观。”这与以往对沈从文的认识有非常大的分别。把他从“野蛮”和“异域”的表象中解脱出来，看到了他作品的那种非常宽广的关怀和悲悯。聂华苓重点分析了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形象。她认为他们类似于加缪的“陌生人”，他们是一些与时间和空间，与整个现代文明脱节的人^②。这为理解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展开了一个与沈从文的作品相匹配的宽广视角，和与其作品相匹配的理解“人”的深度的视角。凌宇对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的分析渊源即在于此。由她的研究可以看出，越是站在我们的文化之外，越是容易看到沈从文身上那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的根。这部著作对开拓沈从文研究的视野起了不小的作用。

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是美国的金介甫。他在1977年就以《沈从文笔下的共和国时代的中国》为博士论文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本论文在1994年才翻译到中国，名为《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和文化》。他1979年就与沈从文本人取得了联系。虽然他的著作在中国出版较晚，但他的研究对沈从文研究的推动作用还是很大的。因为他的研究在当时有表示中美友好的重大意义。沈从文在给金介甫的信中，也表达的是中美友好的愿望。金介甫对沈从文的研究是从“史”的角度进行的，在他的眼中，沈从文笔下的世界烛照着整个中国世界。他师从著名的历史学家费正清，费提出“沈从文的著作具有社会史料的研

① 夏志清《文学的前途·沈从文的短篇小说》[M] 北京：三联书店 2002 86 - 111.

② 聂华苓《沈从文评传》，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C]. 641,644

究价值”。金介甫进行的沈从文研究是以研究“中国历史诸问题”为基础的。他认为沈从文的作品可以当“历史附录”来读,可以把沈从文当做“一名社会历史的评论员来研究”。沈从文笔下的世界更真实,因为他“没有受社会分析模式的先入之见的约束”^①,他为我们描绘而不是解说这个世界。这与沈从文的时代所有的评论者对其所作的评价都大相径庭。使他那些看起来像是清澈的小溪一样的作品变成了一条大河。金介甫的著作的实证特点开拓了沈从文研究的新视角。但将沈从文书写的湘西来代表整个中国的历史图景,如他的书名所说的“中国社会和文化”,显然是带有西方式的猎奇的眼光的。但沈从文的作品无疑具有史的品格,可以从社会历史角度展开研究。

香港的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对沈从文作品的审美价值做了很大的肯定。这方面的研究少有禁忌,更容易被接受。从“审美”的角度来研究沈从文一直是看重他的研究者的共识。所以能起应有的推动作用。

三、沈从文被“发现”的当代语境

对沈从文的重新发现,就像戴望舒的《偶成》中所说的:“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迢遥的梦。这些好东西都决不会消失,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开放。”就像戴望舒的《我思想》所启示的那样:“我思想,故我是蝴蝶……万年后小花的轻呼,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来震撼我斑斓的彩翼。”^②真正的理解可以穿越时空,穿越一切阻隔,让理解者和被理解者遥远地呼应,相通。沈从文的作品就是那美丽的蝴蝶,不管相隔多远,终会有“小花”们懂得它“斑斓的彩翼”。新时期的研究者对沈从文的认识必然建立在对之前所有评论的清理上。而这之前国内对沈从文的认识多有片面,或者是建立在对他的部分作品(往往并非代表性作品)的批评上,或者是对他进行片面的意识形态的定位。以此为基础,真正地研究是难以展开的。要真正认识沈从文,必须从他的作品出发,只有潜心地倾听他的作品所蕴藏的那些非常沉痛的无声的呐喊,才能真正地接近他。沈从文的老友,与沈从文共同经历了时代的风雨和沧桑的朱光潜,在谈到沈从文的认识时,潜藏了对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追悼。他听到了沈从文作品中所流淌出来的悲声。

^① 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和文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1,5,3

^② 戴望舒.《偶成》、《我思想》,《戴望舒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23,99.

他说:《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深忧隐痛”,说沈从文“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①。认识沈从文是要以对生命和苦难的深层理解为基础的。当代的研究者们实践了这一点。

凌宇说沈从文在大陆的被“发现”也具有“拨乱反正的政治意味”^②。沈从文的作品再研究被作为“拨乱反正”的一种文化配合,首先是从政治上对其进行平反。实际上,对沈从文作品的误解并不与政治上错误的文化政策相关,他是在一开始就被视为异类的。这种误解完全是由文化上的狭隘造成的。“反右”和“文革”的文化政策不过是加剧了这种误解,使那些潜在的误解明朗化并以评论的方式定性下来,给新时期的研究增加了新的难度。总的来说,沈从文作品的意义放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释放是有其本身的曲折性的,不是哪一个人的人为误解,而是整个文化上的偏差。这也是他的作品研究和理解首先由西方发起的缘故。“平反”的视角使得研究者们每每捉襟见肘,因为只要带着辩护的意图,就很难贴近本质。用任何的一种现成的理论或观念来界定沈从文都显得差强人意。沈从文的作品中很有一些与现代文学的国民性批判相似,与左翼文学靠拢的内容。这是新的研究展开的一个良好基础。新的研究打开了沈从文那座封闭已久的园子,大家发现到处是风景。

沈从文完全自由主义的政治态度给他带来了很多的麻烦。这个对政治极度疏离的作家却每每在政治与文学的交汇处出现,政治关注是他对人的生存关注的一个延伸,也是他为维护文学的独立性所做的努力。他与新月派的特殊关系,他所挑起的“京海派之争”,他反对“差不多”现象直接针对左翼,他“反对作家从政”,他与《战国策》派的牵连,他对于内战的极力反对,这些都把他推向了反面,左翼有很充分的理由排斥他,因为他确实和他们很不一样。沈从文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批判性。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政治,因为他认为政治干涉了人民的生活,让他们更苦,政治侵害了文学,让它成了某种附庸。这是他监守的两块阵地,他为之而战就有了理性。这种政治立场是太简单了,任何一个党外人士都可能持这种观点。他的错误在于他竟然以为一个政治之外的人能阻挡政治对文学,对人的生活的侵袭。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政治良知,不管对错,沈从文是履行了自己的良知的,顶着很大的风险,从这一点上来说,没有错。他

^① 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花城》J. 1980 年 5 月总第 5 期

^② 凌宇.《重建楚文学的神话文艺系统》[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5 279

是所有意识形态的异类。这从他作品在 1949 年后在大陆被冷落和遗忘，在台湾被封杀的坎坷命运上显示得最清楚了。如果不是时代使然，原本是不需要为之进行辩解的。但新的研究必然从辩护开始。

凌宇认为沈从文所有这些政治的牵扯是源于他特殊的政治观：“怀疑论成了他观察中国现代一切政治现象的核心。”^①论证的结果是“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而是一个既对历届军阀政府及国民党政府取批判态势，又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保持距离的民主主义者”^②。对之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沈从文的作品“展开了中国下层人民生活的逼真图景”，“沈从文反映下层人民生存权利和人生尊严的要求，植根于他对下层人民作为人，具有同别人一样的人性认识”。与之相应的是沈从文对上层社会的“愤疾与厌恶”。凌宇的研究主要是从政治立场上为沈从文争得优势。沈从文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的，而且是穷苦的下层人民，他们“经济极端贫困，生命朝不保夕，人格惨遭践踏”^③。凌宇贡献了他的《从边城走向世界》。这是国内沈从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它标志着沈从文研究的真正开始。从“生命”和“乡下人”的角度深入沈从文的作品，凌宇抓住了沈从文精神的根基。凌宇还抓住了“常与变”在沈从文思想意识中的重要地位，这是沈从文看待湘西历史流程的重要的文化视角也是其主要的政治视角。

如果说凌宇的研究意在统一沈从文思想的懵懂和含混，赵园的研究则揭示了沈从文思想意识中的种种矛盾。在《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中她对“湘西世界”的提炼和解释，认为沈从文是一个从审美的角度入手建立社会理想的矛盾体。她发现了沈从文以男性为中心的“妇女观”和他亲切的“等级意识”。这些也表现着他的个性。沈从文的个性化，准确地应该说是个人性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个性。他的个性源自他敏锐的艺术感觉和对自我感觉的绝对信任。个性的形成是一个由意义的空白逐渐走向意义的丰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只按照自己的感觉来判定他眼中的世界及其意义。从而使他的意义场最终也没有非常明朗的边界。包括那些吊脚楼风情和对女性的偏见都来源于他固执的自我感觉，读者完全可以感觉到他对自己的感觉是多么的信任。而他从感觉的角度对世界的认识和文学化确实给我们保留了很多真实的东西。他对女性的这种认识，其实展示了现代男性作家永远不肯说出口的一些感觉。中国女

^①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 北京：三联书店 1985 101

^② 凌宇《重建楚文学的神话文艺系统》[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5 289

^③ 凌宇《重建楚文学的神话文艺系统》[M] 148

性地位的低下不会随着五四的一声呐喊一下子有根本的改变。我们从某些当代作品中还能很容易地看出男性作家把女性作为附庸和慰藉的那种比沈从文要阴暗得多的心理。沈从文太不善于用先进的思想武装自己了。他是拒绝不触动他感觉的东西进入他的文学的。所以他的“真实”也是完全个人化的。缺乏公众语境的基础，一再被误解也是自然的。沈从文坚持了某种谬误的真实情感。赵园与凌宇的分歧在于，赵园认为沈从文关注的是“下等人”而不是“人民”，这里面有很大的不同，关乎作家的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凌宇和赵园都强调沈从文与现代中国作家的深刻的精神联系。他们从文学、文化的角度看待沈从文，也从社会进步的立场上去对沈从文提出要求，表示遗憾。

对沈从文的重新发现一直围绕着当代的种种思潮，研究者们欣喜地发现，沈从文的作品居然与这些新的思潮和理论每有契合，他几乎成了当代语境下的一块发掘不尽的宝藏。首先是“人性”的高扬。沈从文的被发现伴随着80年代初期作家们对“人性”呼唤。在“寻根文学”的浪潮中，沈从文也是一种重要的解读和参照的对象。中国文坛和理论界掀起弗洛伊德的热浪时，沈从文也成了一个很适合的解读对象。叙事学的引进也使沈从文那些形式的探寻有了意义。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沈从文研究的禁忌被一一打破了。研究者们把触角伸到了沈从文能够涉及的任何方面。甚至又有人开始质疑沈从文的价值，如刘永泰的《人性的贫困和简陋——重读沈从文》，完全是从非文学的角度看待沈从文。一离开文学这块阵地，沈从文的价值就很难界定，而太容易招致非议了。但无论如何，从每年不断涌现的以沈从文研究为主题的各种著作，硕博论文，期刊论文上可以看到这一点：他已经从边缘走向了中心，这是沈从文一直很自信会迎来的一天。

如何平衡审美和社会批判的视角在沈从文研究中的意义，是本书的努力。沈从文不仅有大量题材和主题各异的文学作品，还有大量的杂感和评论。双重视角的介入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他。他的“社会——官能化审美”的创作观也是建立在这种平衡当中的。他有自己的社会关照和批判的方式。沈从文的杂感和批评都非常重视对时代总体倾向的关照，在这种语境下，他往往将自我置身在这种时代性的总体倾向之外，也就是说，他对这种总体倾向总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他一直坚持着这种边缘性。而他所总结和针对的这种总体倾向和左翼文学的发展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这使得沈从文和左翼文学之间有了极为复杂的关联，甚至关系到沈从文本人的创作和命运。本书着重梳理沈从文与文坛的复杂关系，沈从文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沈从文与时代的复杂关系，